

大师传记馆

Walter Benjamin

本雅明思想肖像

刘北成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本雅明思想肖像/刘北成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6
(大师传记馆)

ISBN 978-7-300-15775-7

I. ①本… II. ①刘… III. ①本雅明, W. (1892—1940)-传记 IV. ①K835.1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01097 号

大师传记馆

本雅明思想肖像

刘北成 著

Benyaming Sixiang Xiaoxia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 × 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15.75 插页 2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37 000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 言

1940年9月26日，为躲避盖世太保的迫害，德国犹太人学者瓦尔特·本雅明在从法国逃亡到西班牙边境时自杀身亡，时年48岁。他的好友、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得知消息后沉痛地说：“这是希特勒给德国文学界造成的第一个真正损失。”

当时本雅明没有什么名气，有布莱希特这种哀痛感的人寥寥无几。本雅明生前生活漂泊，事业坎坷。除了大量见诸报刊的评论文章外，只有两部著作问世——《德国悲剧的起源》和《单向街》。而这两部著作也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

桂冠是在多年以后才落到死者头上。从1955年起，本雅明开始被重新发现，引起西方知识界的瞩目。这一年，本雅明生前好友阿多诺夫妇克服了种种困难，出版了德文两卷本的《本雅明选集》。从此本雅明声名鹊起。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西方新左派运动更是把“本雅明热”推至极端。由朔勒姆和阿多诺于1966年编辑的德文两卷本《本雅明书信集》终于在1978年问世，1972—1989年，由蒂德曼（Rolf Tiedemann）和施韦本豪泽尔（Hermann Schweppenhauser）编辑的德文7卷本《本雅明全集》陆续推出。各种英文选译本也先后问世。研究本雅明的专著和文章大量涌现，数以千计。现在本雅明已经为西方知识界家喻户晓，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最伟大的文学评论家，他的著作被视为文化批判的经典。

近年来，本雅明也引起我国知识界的广泛兴趣。198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中译本。许多著述中也论及本雅明的思想，主要是美学思想。

但是，关于本雅明在现代学科中的定位，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有

人指出：“本雅明被今天各种不同的人分别视为历史唯物主义、否定神学或文学解构主义的权威学者，但是他本人从来没有找到一个政治、宗教、或学术的家园。”^① 他的大多数文章偏重于文学评论，但仅仅用“文学评论家”不足以概括本雅明的学术建树。因为他的主要著作涉及美学、语言学、哲学、历史等许多领域，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即使是文学评论也带有哲理性。不过，他很少写纯粹的哲学论文。他的许多思想往往是通过意象表达出来，或者说，他实践着一种“诗思维”。不少研究者主张给本雅明冠以“哲学家”的头衔。他们解释说：“本雅明旨在创造一种涵盖经验整体的哲学。他力求使经验哲学化，使之成为真理的经验。由于这种广阔的抱负，他与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分道扬镳，而使自己的研究与文学结盟。正是在体系化的哲学放弃对其传统整体的权利时，本雅明依然忠实于那种传统，但却拒绝其体系形式，而对文化经验的对象进行‘直接’的哲学化。”^② 由此，可以简单地说，本雅明是一个独特的哲学家或思想家。

关于本雅明的基本思想取向的定位，更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甚至有人说，在20世纪的学者中，没有谁能像本雅明（和福柯）的著作那样被广泛阅读并适合于如此众多的各不相同的思想和政治传统。以阿多诺为代表的一派，坚持把本雅明的著作放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框架中，视之为该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收获中的一部分，尽管是边缘的一部分；以朔勒姆为代表的犹太文化研究学者，强调本雅明思想中的犹太神学来源，并认为本雅明的思想主旋律最终回归到犹太教救世主义；新左派运动则塑造出一个“布莱希特式的本雅明”形象，鼓吹本雅明不屈从于任何学派、任何思想传统的反叛创新精神。阿伦特和桑塔格反对上述各种观点，把本雅明说成是一个思想开放、兼收并蓄的旧式“文人”或“最后一个知识分子”。中国学者张旭东认为在本雅明身上“融合了一个马克思和一个现代诗人的倾向”。等等。

① Norbert Bolz and Willem van Reijen: *Walter Benjamin*, p. 1.

② Andrew Benjamin and Peter Osborne, ed.: *Walter Benjamin's Philosophy: Destruction and Experience*, pp. x-xi.

本雅明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之所以如此变幻多端，从他这方面看，是由于他的思想的复杂性造成的。正如桑塔格所说，本雅明同时保持着几个可能的立场（位置）间的平衡。本雅明青年时代受到浪漫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犹太教救世主义和社会主义产生兴趣，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开始部分地转向马克思主义，但是不能接受苏联官方的马克思主义。以后，他与布莱希特的“朴素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研究所的“辩证马克思主义”以及朔勒姆的犹太教救世主义都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尽管当时这三方中的每一方都指责其他两方对本雅明的“有害影响”，但与这三方的关系（当然不仅这个原因）也促成了本雅明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在法西斯主义对他个人生命的威胁日益逼近之时，他滞留法国而最终导致的悲剧，更带有令人感怀的暧昧性。他之所以滞留法国，一方面是因为“这里还有需要保卫的（文化）阵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困境：无论巴勒斯坦、苏联，还是美国，都不是他的思想和情感可借以安身立命的家园。而他的绝望，既蒙着法西斯主义肆虐的巨大阴影，也是本雅明自己思想的逻辑结论。

本雅明独特的心路历程无疑与他的土星性格和文化趣味、他的个人生活遭际，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但是，放大了看，本雅明的思想复杂性也恰恰从一个角度反映了20世纪前半叶精神生活的紧张矛盾。

首先是犹太人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的困境。狭义地说，本雅明的思想经历是那一代犹太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缩影。

19世纪，欧洲犹太人逐渐走出格托（ghetto，即各城市中特设的犹太人隔离居住区），获得与居住国公民相同的权利。到20世纪初期，犹太人在欧洲绝大多数国家争取到法律和政治上的全面解放（当然，尽管有些犹太人进入了所在国家的社会上层，但是犹太人受歧视的状况并没有彻底改变。不过，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几乎没有人会料到，这些政治解放的成果会在顷刻间化为乌有，出现惨绝人寰的纳粹集中营大劫难）。

但是，犹太人也就由此而面临一个重大的历史悖论和新的历史抉择。因为这种解放还包含着另一方面的含义，即与政治整合相伴的是社会同化和文化同化。各国犹太人不能再作为一个有统一特性的民族存在了，他们

必须放弃犹太特征。他们成为各自国家的公民，也就必须放弃建立自己祖国的理想。他们要全面进入各个不同国家的社会生活，也就必须走出狭隘的精神世界，使自己向所在国家的主流民族文化开放。犹太人认同问题出现了。这个问题对于犹太知识分子尤为突出。生为犹太人，意味着什么？在启蒙向宗教发出强劲的挑战之后，在普遍的理性时代，还能为犹太教辩护吗？如果不再相信耶和华的启示，还是犹太人吗？如果说基督教民族拥有作为民族的自决权，那么犹太人为什么没有？

总之，在犹太文化与西欧现代文化的接触中，启蒙的普遍主义及其派生的民族国家观念与犹太人的特殊主义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是外部的，而且是内在的、精神的。在这种历史悖论面前，犹太知识分子发生了分裂。有的坚持犹太文化和宗教传统，聚集在犹太复国主义旗下。有的则不仅认同于所在国家，而且认同西欧文化，皈依基督教。海涅曾表示：“洗礼是进入欧洲文明的入场券，那么谁会让这样简单的一个仪式挡住他的去路呢？”有的超越了宗教，转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根本漠视自己的犹太人出身，自称“世界公民”。他把犹太人特性说成是“利己主义”，“一般性的现代反社会的因素”，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也有不少人处于痛苦的困境，如卡夫卡。

不难理解，正是这种历史境遇，使得犹太民族在这个历史时期贡献出大量杰出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本雅明的思想转向和矛盾也是这种历史转变和抉择时期的产物。

本雅明的思想经历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 20 世纪上半期西欧知识分子的艰难抉择。

本雅明的少年时代正值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西欧和平发展的时期，也是西方哲学和社会思潮的转折时期。美国历史学家亨利·斯图亚特·休斯指出，在当时敏感的思想家眼中，“19 世纪 90 年代是以世纪末的形态出现的——那是一个过度成熟的、邪恶的、矫饰的、衰败的时代，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们采取了一种反启蒙的态度，但是“他们的敌意不是针对 18 世纪的启蒙形态，而是针对这种传统在 19 世纪末的歪曲化身——实证主义崇拜”。他们倡导的是一种新浪漫主义或新神秘主义，目的是“使受到前一代人所嘲弄和忽视的‘想象力的价值’恢

复昔日的光彩”^①。因此，我们看到，在德国，尼采主义、新康德主义等盛行于世。而本雅明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投身于浪漫主义的“青年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欧的流行价值观几乎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战争初期，各国的知识精英几乎都立即热情高昂地拥护本国政府的“正义”战争。大批年轻的诗人、艺术家、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志愿应征入伍。但是，出乎他们的意料，战争漫长而残酷，现代化的技术导致了空前恐怖的屠杀。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创伤下，他们对西方文明的失望弥漫开来。从浪漫主义转向救世主义的社会主义，成了一种可选择的出路。我们看到，卢卡奇、布洛赫和本雅明几乎同时发生了这种转变，按照卢卡奇的说法，在思想上形成“左的伦理学和右的认识论的结合”^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的历史，正如本雅明所说，“从一个方面看是左翼知识分子的历史”。当时，苏联的崭新形象与西欧的混乱萧条形成鲜明的对照。西欧知识界普遍对苏联寄予很大的同情与希望。拥护苏联，加入共产党，成为一种潮流。但是，苏联官方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宗教化，也使得一些深受西欧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心存保留。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反映。这种心态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心理基础。斯大林的“大肃反”无疑进一步疏远了许多革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如果说对法西斯主义的同仇敌忾仍然是维系左翼知识分子与苏联和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那么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定则像晴天霹雳，使他们产生一种痛切的被出卖感和绝望（当时西欧许多真诚的信仰者开始大批退党）。我们看到，在这段时期，本雅明的思想变化也大体上循着这样一个轨迹。卢卡奇曾经对此有过解释。1970年英国《新左派评论》记者采访卢卡奇时问：“您认识瓦尔特·本雅明吗？您是否认为，如果他活着的话，他会向信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卢卡奇答道：“不认识。由于一些原因，我从未与本雅明见过面。……本雅明天赋过人，洞察了许多很新的问题。他以各种不同的方

① 亨利·斯图亚特·休斯著，李丰斌译：《意识与社会》，1、2章，台北，联经图书出版公司，1981。

② 卢卡奇著，杨恒达译：《小说理论》，13页，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8。

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考察，但是从来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我认为，如果他活着的话，尽管他和布莱希特很友好，他如何发展还是很难说的。你必须记住，时代曾是多么困难——30年代是清党，然后是冷战。在这种气候下，阿多诺开始提倡一种‘违心的顺应态度’。”^①

从更深或更一般的意义上看，本雅明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方人文知识分子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困惑和求索。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是第一个提出明确的“现代性”概念的哲学家。自黑格尔以后，在西方文化的现代历史意识中，由于现代意味着弃旧图新，意味着与过去的不同，因此，“现代再也不能从别的时代所提供的模式中来借鉴可以作自己方向的标准，即它不得不从自身中创造自己的规范”^②。时尚翻新是现代性的题中之义，价值的永恒性和神圣性也就丧失了根基。在这种语境中，知识分子的“苏格拉底张力”空前地加剧了。所谓苏格拉底张力是指知识分子的内心冲突和他与外界的紧张状态。这种张力的原因在于，知识分子既是文化生活的创新者，又是文化的保存者和终极价值的关怀者。作为前者，知识分子可能成为现代性的风头人物，但作为后者，知识分子又被商品社会边缘化了。创造时尚和终极关怀发生严重的背离。

波德莱尔成为本雅明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不仅仅是由于本雅明本人的诗人气质与波德莱尔产生共鸣，更主要是由于本雅明对波德莱尔所体现的现代社会边缘人的形象——“闲逛者”的共鸣。

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发现”是独具慧眼的。哈贝马斯指出，在19世纪，正是波德莱尔最敏感地触及了现代性问题。哈贝马斯说：“在现代自身中寻找现代的根基的问题首先被美学批评领域所意识。……尽管作为名词的‘现代’以及作为形容词的‘古代的’/‘现代的’对偶词早在古代晚期就开始被使用，但在欧洲语言中形容词‘现代的’只是在19世纪中期才独立使用，而且依然首先是在艺术领域中使用。”^③ 对于波德莱

① 杜章智编：《卢卡奇自传》，301~30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②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p. 7.

③ Ibid., p. 8.

尔来说，“现代是过渡性的，稍纵即逝的，偶然的”。他拒绝古典的、传统的价值。他是片刻欢乐的专家：“他所寻找的是某种难以说清的东西，我们可称之为‘现代’……他的目的是从时尚中提取诗意，从昙花一现中提取永恒。”

与波德莱尔不同，在本雅明的美学体验背后有着一种更深刻、更悲观的历史哲学意识。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之后，“技术”成为本雅明思考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在技术发展的时代，他恐惧地看到历史的悖论：工具理性的无限膨胀（如语言、文化被工具化），世界的商品化和拜物教，世界大战中技术造成的毁灭，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灵韵的消逝，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物种的灭绝……他的怀旧不是对曾经罩着“文明”光环的统治阶级的哀悼，而是对历史上被忽视、被湮灭的民间文化遗迹的追寻。救世主义是本雅明悲观主义的补充和完成。在他的“当下”（Jetztzeit）时间概念中散发着急不可耐的焦虑。在历史哲学的宗教神学取向早已被启蒙思想废除了的条件下，对于本雅明来说，革命的共产主义（毋宁说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暂时地和现实地成为救世主义的一个可能的化身。

本书是本雅明的传记，除了描述本雅明的生平事迹外，着重对他的主要著作做了评述。作为第一步，主要对本雅明的论述逻辑进行梳理，还没有对本雅明的某些重要思想展开集中和充分的评论。另外，本雅明的一个特点是“诗意思维”。或许对本雅明的描述也应该用诗意—哲理的笔法，而本书没有做到这一点。有一百个读者，就会有一百个本雅明。本书仅仅是描述本雅明思想肖像的一个尝试。如果读者读了以后说：“这不是我心目中的本雅明”，并且想描述出自己心目中的本雅明，那正是笔者所希望的结果。

为了有助于读者对本雅明的理解，作为附录，选择了三篇西方学者对本雅明的经典性评论。这里要感谢石涛先生。他慷慨地提供了他翻译的《单向街》英译本序言，并允许我对之做了补正。

本书的写作得到其他许多人的惠助。美国亚拉巴马州特洛伊大学刘京秋教授在资料方面给予鼎力支持，在此特别致以谢意。

刘北成

1997年4月25日于北师大文史楼

目 录

第一章 柏林西区	(1)
第二章 青年运动	(8)
第三章 朔勒姆和犹太教	(19)
第四章 语言与经验	(28)
第五章 救世主义与政治	(42)
第六章 新天使	(51)
第七章 德国悲剧的起源	(63)
第八章 单向街	(82)
第九章 莫斯科之行	(91)
第十章 超现实主义	(100)
第十一章 破坏型性格	(110)
第十二章 小驼背	(124)
第十三章 巴黎的梦幻	(138)
第十四章 历史天使	(149)

附录一：《启迪》（本雅明文选英译本）

导言	[美] 汉娜·阿伦特 (161)
----------	------------------

附录二：《单向街及其他作品》英译本序言

[美] 苏珊·桑塔格 (203)

附录三：论瓦尔特·本雅明

[爱尔兰] 理查德·卡尼 (219)

主要参考文献	(239)
--------------	-------

第一章 柏林西区

瓦尔特·本雅明的全名是瓦尔特·本迪克斯·舍恩弗利斯·本雅明（Walter Bendix Schonflies Benjamin）。他在1892年7月15日出生于柏林一个被同化的犹太商人家庭。在德国，本雅明是犹太人专有的姓氏。

从18世纪后始，一些先进的犹太人开始走出封闭的犹太人居住区——“格托”，呼吸到欧洲文化的新鲜空气。19世纪，许多德国犹太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融入德国社会。早在1812年，普鲁士首相哈登贝格颁布《关于犹太人公民地位的法令》，宣布：“凡在我国居住，并持有入籍证、护照和特许证的犹太人及其家庭，应视为本国人和普鲁士国家的公民。”他们可以获得与基督徒相同的公民权，但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①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中的社会同化与文化同化也迅速进展。19世纪上半期德国中上层犹太人中间的哈斯卡拉（启蒙运动）导致许多人脱离犹太教，皈依基督教。他们把改变宗教信仰当成是进入欧洲文明和欧洲社会的一张入场券。著名诗人海涅改宗就是其中的一个著名事件。^②

本雅明的父系家族很久以前就来到莱茵地区经商。他的祖母布鲁涅拉·梅耶尔（Brunella Meyer）与诗人海涅是同一母系的姑表兄妹。^③本雅明的祖父母都是在哈斯卡拉的浪潮中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本雅明的父亲埃米尔·本雅明（Emil Benjamin）生于1866年，在巴黎度过青少年

① 参见丁建弘、陆世澄主编：《德国通史简编》，232～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② 参见沃尔特·拉克著，徐方、阎瑞松译：《犹太复国主义史》，第一章，上海，三联书店，1992。

③ 参见 G. Scholem: *Walter Benjamin: 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 p. 18。

时代。

本雅明的母亲保莉妮·舍恩弗利斯（Pauline Schonflies）出身于东普鲁士一个经营谷物和牲畜的商人家庭。她姊妹4人。另外还有一个兄弟阿瑟·舍恩弗利斯（Arthur Schonflies），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

本雅明的父母两家都是在1871年以后移居柏林的。两家成为住在同一条街上的邻居。埃米尔·本雅明和保莉妮·舍恩弗利斯在1891年结婚，居住在柏林西部的格仑瓦尔德街区。这是一个富人区。

瓦尔特·本雅明是长子。他有一个小三岁的弟弟格奥尔格（Georg）和一个小九岁的妹妹朵拉（Dora）。格奥尔格后来成为一名医生，他加入了德国共产党，热忱地在柏林工人区服务，1942年死于纳粹集中营。格奥尔格的妻子希尔德（Hilde）被本雅明称作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姑娘”，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在法西斯统治期间，她幸免于难。战后，她曾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司法部长，对纳粹分子进行清算。朵拉长大后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终身未婚。战争期间，她从巴黎逃到瑞士。1946年病故于苏黎世。

在本雅明家里，没有浓厚的宗教气氛。宗教只剩下了形式。一方面，母亲因袭传统，带着孩子参加庆祝犹太新年的聚会。另一方面，圣诞节时家里也摆放着圣诞树。但是，如本雅明后来解释的，从他的祖父母起，他们实际上把圣诞节看成是“国家节日”。^①

本雅明上学前曾和几个富人家的孩子一起接受过私人教育。1902年，他10岁时进入位于萨维尼广场的恺撒·腓特烈学校。3年后，父母又把他转到位于图林根的一所乡间寄宿学校——豪宾达学校。1907年，他又转回到恺撒·腓特烈学校。1912年，20岁的本雅明从该校毕业。

本雅明的少年时代正值德意志帝国鼎盛时期。1871年，德国在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的领导下实现统一。德意志帝国在欧洲中部赫然崛起。在赶超英、法的现代化战略思想指导下，德国的经济迅速发展。进入20世纪初，德国已将英、法抛在后面，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大国和仅次于美国的世

① 参见 G. Scholem: *Walter Benjamin: 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 p. 35.

界第二工业大国。

本雅明少年时代目睹了柏林开始向现代化大都市的急速转变。城市在扩大，并开始进入电气时代。电话是在本雅明出生的那一年问世的，很快就进入了他的家庭。^①

德国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胜利。这种民族主义是在英、法启蒙运动和现代化的挑战下产生的，借助普鲁士容克军国主义，终于扬眉吐气。因此，在德国，现代化的合理主义与普鲁士传统的等级制、军国主义以及宗教伦理等权威制度结合起来，笼罩着社会。在本雅明眼中，柏林旧式的建筑就像是这些旧制度的象征，构成了他少年时代的社会氛围。

本雅明在 40 岁时回首往事，写下《柏林记事》。^② 但这部篇幅不长的回忆录并不是传统的自传体，而是描述青少年时代所认识的柏林，以空间为线索展开的往事回忆。本雅明声称，他多年来就想在地图上标示自己生活的轨迹。这部作品是以本雅明 3 岁时由保姆带领上街开始认识柏林写起，顺序描述了居住区、广场、公园、游乐场所、学校、剧场以及本雅明后来参加的“青年运动”的聚会地点、与朋友聚会的咖啡馆等，并记述了自己在这些空间的体验。

对于这种写法，本雅明做了说明。他认为，回忆的意识流绝不会按照时间的流程回溯，因此，“回忆不应该采用叙事的方式，更不能采用记录报道的方式，而应该采用最严格的史诗的（epic）和狂诗的（rhapsodic）方式”。“回忆录，即便充分展开，也并不总是等同于自传。这些回忆确实不是自传，即使我在这里仅仅是谈在柏林的岁月。因为自传必须涉及时间，涉及前后关联，构成生活的连续流程。而我在这里谈论的是空间、片刻和片断。”

本雅明承认，这种写法是受到一些作家有关巴黎的描写的启发。他特

① 参见 W. Benjamin: “A Berlin Chronicle”, *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p. 326.

② 《柏林记事》写于 1932 年。英译文 “A Berlin Chronicle”，见 W. Benjamin: *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pp. 293-346。本章以下有关引文除注明者外均出自此文。

别喜欢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他曾对朋友说：“我一直确信他（指普鲁斯特）的哲学视角与我极其相近。每当我读他写的东西时，我就感到我们心灵相通。”^①

本雅明在另一篇文章中论述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时也指出：“我们知道，普鲁斯特在其著作中描述的不是实际发生的生活，而是一个有过这种生活的人对这种生活的记忆。……对于回忆往事的作者来说，重要的不是他经历了什么，而是对他的记忆的编织。”^② 这些见解同样适用于本雅明自己的回忆。

无疑，《柏林记事》是本雅明 40 岁时思想和情绪的一个反映，但作为一部回忆录，它也向我们展示了本雅明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并且透露了他青少年时代精神历程的一个重要侧面。

《柏林记事》用片片断断的回忆造成了一种距离感。这不仅是与遥远时光的距离感，而且也表现了作者从小对环境的疏离感。

本雅明声称，自己是“在孤独的游戏长大的”。幼小的本雅明是一个被保姆和母亲带入柏林这个“霍亨佐伦时代的迷宫”的游逛者。直到大学期间，他始终有一种“在城市面前的无力感”。他跟随母亲上街时，总是保持半步距离。“我的动作习惯看上去比我实际更缓慢、更笨拙、更愚蠢，这种动作习惯就起源于这种在街上行走。”

本雅明童年时对柏林这个城市没有家园感。他把这归因于自己的父母都不是土生土长的柏林人。

本雅明对童年时代家庭生活的回忆包含复杂的心理，既有对富家子弟衣食无虞和欢乐生活的怀旧，又表现出冲出犹太市民资产阶级环境的围城的强烈愿望。

在本雅明如梦如烟的回忆里，童年的时光是快乐的。19 世纪末的柏林呈现着一派安谧祥和景象。冬天，在悠扬的音乐声中，溜冰者在公园湖面上飞梭旋转。夏天，网球场则成为青春的场所。在公园湖畔，牙牙学语

^① *The Correspondence of Walter Benjamin, 1910—1940*, p. 278. 以下简称 *Correspondence*。

^② W. Benjamin: “The Image of Proust”, *Illuminations*, p. 204.

的儿童玩耍沙土，年轻的保姆们坐在附近的长凳上读着小说，老年孤身男人手拿着报纸，混迹在那些轻浮的姑娘中间。

在写《柏林记事》时，本雅明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承认：“他的童年被封闭在他所生活的区里——旧西区或者说是新西区。这里居住着他被宣布为其中一员的阶级。这个阶级自鸣得意，态度傲慢。结果这个区变得类似于租住的格托。总之，他局限于这个富人区，而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况。至于穷人，对于他这一代的富家子弟来说，他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他在另一篇回忆中甚至把居住的房子说成是“早就为我准备的陵墓”。

本雅明把自己家庭划定为“富有的中产阶级”。他写道，他只知道“父母很富有”，但是始终不知道确切的经济收入情况。他推测，家庭财政不仅对他这个长子保密，恐怕母亲也不知其详。他说：“在犹太人家庭里通常都是这样。当然，许多基督教家庭也是如此。”

幼时的本雅明过着优裕的生活。他还记得家里有许多银制餐具。有时他和弟弟一起随母亲上街逛商店。鞋帽衣服都分别在固定的老字号店铺购买。采购结束时，母亲给他们兄弟的犒劳，是在一家固定的店铺要一杯热腾腾的奶油巧克力。

每年夏天，除了偶尔的夏季旅行外，全家都到离家不远的别墅去住。最初是到波茨坦，后来到新巴贝尔斯堡。

本雅明有时到外祖母家去玩。外祖母有一所宽大的住宅，里面有12~14个房间。本雅明从小爱好收藏明信片，“这种收藏的主要贡献者是我的外祖母”。寡居的外祖母喜爱旅游。本雅明说：“几乎很难想象她这样一个老妇人是如何漂洋过海和骑骆驼远游的。”外祖母寄回的明信片激起本雅明对旅游的向往和迷恋。他说：“我从外祖母那里继承了两件事：喜爱送礼和喜爱旅游。”

本雅明不能理解甚至厌恶父亲所从事的资本主义商业活动。他认为：“尽管有由于出身和社会价值导致的一系列约束，我的父亲骨子里拥有作为一个大商人的企业家气质。”父亲原来是列普克艺术品拍卖行的合伙人之一。由于某些令人不快的原因，父亲撤出股份，转向投资活动。他既从事股票投机，也投资于其他实业，包括在柏林和家乡的食品、酿酒等行业。他从此在家里进行交易活动。在幼小的本雅明心中，资本主义商业界

有两种不同的形象：一种是随母亲购物时接触到的形象，另一种是父亲在饭桌上和打电话时的言谈话语使他想象的那种“陌生的和稍微有些凶险的形象”。他说：“我怀疑，这（父亲从事的行业）是一个真正令人快乐的行业。”

在本雅明的回忆里，商业活动也把父亲变成两面人。平时，父亲待人温文尔雅，但是当父亲用电话进行交易活动时则露出一副暴戾嘴脸。本雅明在根据《柏林记事》改写的《1900年前后柏林的童年》中对此做了更形象的描述：“我的父亲与官僚机构发生分歧是常有的事，更不必说他对申诉部门发出的威胁和谩骂。但是，他真正的亢奋时刻是摇电话机柄。他会连续几分钟做这件事，以至达到忘我的程度。此时，他的手就像是屈服于酒色的托钵僧。但是，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确信，在这种时候，接线员会受到电击般的威胁，作为对他拖延的惩罚。”^①

虽然本雅明没有直接谈及父亲对子女的态度，但是在回忆大学期间的“青年运动”时说，他们讨论的一个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家庭中家长对待孩子的粗暴。这可能也暗指他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父亲的压抑。

学校是本雅明第一次独自面对的社会机制。他对学校生活的回忆充满了批判。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学校教育带有军国主义特点。恺撒·腓特烈学校尤其如此。在本雅明看来，它是以军队为模式，把学生当囚犯。他进入学校后，觉得自己“无可挽回地陷入这一空间的权力之下”，被一种“我必须成为一个军人”的无形要求所控制和折磨。他在描述这座学校的陈旧建筑时说：“在我的记忆中，对教室的确切情况几乎已经毫无印象，除了那些监狱的象征：结霜的窗户和门上方做工粗糙的木刻装饰物。”

本雅明厌恶学校的纪律。学校在低年级仍然实行旧式纪律——“鞭笞，调换座位和关禁闭”。本雅明说，在学校期间，这种纪律产生的恐怖从未从他心中消失。他也讨厌一年4次交给家长的成绩报告。他尤其反感打断学习的各种活动：到乡村郊游、竞赛，特别是每年柏林地区举行的校际竞赛。后者是“在囚徒基础上决定最佳团队”。本雅明从小动作迟缓，在这些活动中力不从心。他说：“我从来不属于这种学校团队。”

① 转引自 B. Witte: *Walter Benjamin: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p. 16.

本雅明从小就萌生一种对人群的恐惧。学校生活加强了他的这种心理。他描述自己在学校里上楼梯时的感觉：“在上楼梯的时候，我的眼前只有靴子和小腿，我的耳朵里只有上百只脚的擦地声，我经常被这种人群的拥挤所震撼。这时，就好像随着母亲在城市的行人中一样，孤独在我看来似乎是人的唯一适当的状态。”

“学校的整个气氛是压缩凝固的。”本雅明感到很难适应。他在描述学校的礼堂时说：“在这里（指礼堂），和在其他几个地方一样，我在自己的记忆中只找到一些完全固定的词语、表述和句子。……它们给我留下的是那种大集体与我个人的冲突的印记。”

本雅明感到“忧郁和压抑”。他说：“自从离开（恺撒·腓特烈学校）后，我再也没想回去过。”

当本雅明用阶级观点回顾时，他承认，幼年时对社会分裂的认识是模糊的。他谈到儿时过圣诞节的情景时写道：“圣诞节来了。在这个资产阶级儿童眼中，它同时也把他的城市分成两个强大的阵营。但这里不存在被剥削者及其统治者之间不可协调的对立的真正阵营。……圣诞节来了，它把儿童分成两种人：一些孩子在波茨坦广场的货摊前跑来跑去，另一些孩子则在家里奉献自己的玩偶和家禽，卖给同龄的孩子。圣诞节来了，与之俱来的是一个庞大的、陌生的物品世界。”

当本雅明的性意识萌发后，他对妓女产生了色情幻想。由此他也开始面对社会的不幸和犯罪。他概括说：“无疑，第一次跨越自己阶级门槛的意识，也包含了几乎无法控制的想在街上公开勾搭妓女的想法。但是，这里跨越的不仅是社会界限，而且是地理界限，因为整个街道网络都在妓女的引领下而洞开。”

至此，我们看到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极度反感学校生活、陷入青春期苦闷与烦恼之中的少年形象。